

知識人

台灣文化十六家

白先勇 余光中 李亦園 黃進興 王汎森 陳弱水 張广达 韦政通
何怀硕 堙 弦
郑愁予 南方朔 钱水祥 林载爵 蔡文甫 隐 地

李怀宇 著

漓江出版社

知識人

台灣文化十六家

白先勇 余光中 李亦園 黃進興 王汎森 陳弱水 張广达 韦政通

何怀碩 痲弦

鄭愁予 南方朔 錢永祥 林義雄 蔡文雄 隱地

李怀宇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知识人:台湾文化十六家/李怀宇 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2. 1

ISBN 978 - 7 - 5407 - 5479 - 2

I. ①知… II ①李… III ①名人—访问记—台湾省—现代 IV. ①K820.85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37113 号

策 划:郑纳新

责任编辑:刘 鑫

封面创意:李佳(Lika) .

出版人:郑纳新

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网址:<http://www.lj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 - 55087201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(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880mm × 1 230mm 1/32

印张:9.75 字数:200 千字

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539 - 2925659)

自序

我少时读到许多前辈名家的著作,阅历日深,渐渐心仪一些作者。“颂其诗,读其书,不知其人可乎?是以论其世也。”近年来,我在华人世界访问了上百位前辈名家,相谈甚欢,受益良多。二〇〇九年夏天,我有幸到台湾访问,拜会了十多位文化名人。就个人性情而言,我对熙熙攘攘之事只有遥远的兴趣,而对历史与文化,总是不停地追问。因此,我在台湾访问的内容大多涉及学术文化。或可视为一位学生向老师问道解惑的对话,从中探求一些知人论世的史料。

一个世纪以来,中国政局风云变幻,许多知识人饱经沧桑,仍然在文化领域上下求索,使中华文明薪火相传,殊为可敬。我乐此不疲地访问前辈知识人,只希望为历史留下记录,自觉义不容辞。

理解一个人颇为不易,读懂一个时代更是梦话。我从不奢望通过对话就能进入每一位受访者的历史世界,只想在笑谈之中,聆听人生风云,碰撞智慧火花。当讲者赤诚,听者会心,便是愉快的精神旅行。

我旅居在“中央研究院”，不免感染了一丝学术文化的气息。虽然没有学得真学问，我却仿佛经历了如王汎森先生所说的“没有地图的旅程”。闲暇之时，我多次漫步胡适故居，遥想当年胡适的笑容与愁思。一点一滴的进步，一尺一寸的改造，今日新世界是否让胡适乐观依旧？民主与科学是否为百姓谋得福祉？这些疑问激荡脑海，使我在访问过程中尽可能多请教些问题，少纠缠些主义，试图通过平和的探讨，寻找更加恰当的答案。

短暂的旅程中，我时时感受到同胞的人情味。偶遇政治表演，则报以一笑。余英时先生一九九三年在《民主与两岸动向》的“序”中说：“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原则，它的精义不仅在于少数服从多数，而且更在于多数尊重少数。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，它所体现的价值是宽容、开放、多元、不趋极端、富于同情心等等。所以一个民主的社会往往也是一个最有人情味的社会。”而余先生在“序”中同时忧虑的“理想主义精神的稀薄”，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。

翻开历史长卷，中华文化留下了许多动人心弦的篇章。时间已经证明，当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成为常识时，自然有天才成群而来。虽然如今我只能追寻前辈大家的故迹，也是赏心乐事。我访问的十多位先生，即使经受欧风美雨的洗礼，依然保有汉魂唐魄的气概，使我如沐春风。文化不分时间与地域，融会古今，折中东西，自有和谐之美。黄进兴先生说想当一个世界知识公民，相信是许多人的共识。

本书的旨趣在历史与文化，受访者的亲身经历与胸襟见识，早已融入了世界的海洋。历史的变化与文化的交融，“地球村”已不是空泛之词。在访问中，我受到无微不至的礼遇，不曾感觉到海峡之间的

隔膜,深深体会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,油然回忆起童年在家乡榕树下和长辈海阔天空畅谈之乐。“不论海角与天涯,大抵心安即是家。”我有幸聆听精彩人生与智慧,只求自己在漂泊中的心安,如果还能读者增添一点心灵的共鸣,那便是我最大的快乐。

李怀宇 序于悠然居

目录

自 序	1
白先勇	
中国需要文艺复兴	001
余光中	
乡愁是我的一张名片	041
李亦园	
从大视野看全人类	061
黄进兴	
想当世界知识公民	077
王汎森	
真学问是没有地图的旅程	095
陈弱水	
学者应处在批判的状态中	113
张广达	
研究历史要关怀现实	131

韦政通

文化在老百姓的生活里 153

何怀硕

艺术有震撼心灵的力量 169

痲 弦

编辑事业简直是一种伟业 187

郑愁予

人道主义影响我一生 207

南方朔

读书人喜欢打抱不平 223

钱永祥

社会发展需要好的环境 241

林载爵

高品质出版可以影响时代 261

蔡文甫

凡夫俗子没有悲观的权利 275

隐 地

在出版与写作之间寻找诗意 289

后 记

301

白先勇

中国需要文艺复兴



赴台之前,我和白先勇先生在越洋电话里长谈。听说我从未到过台湾,白先勇先生细心叮嘱注意事项,热情推荐采访对象。后来听了我的赴台时间,便说:“我到时正巧从美国到台北,我要请你看《玉簪记》。”我笑道:“您已经在苏州请我看过了。”“不一样,台北的舞台更好!”

赴台后,听说白先勇先生正在忙《玉簪记》的事,不敢打扰。恰巧廖志峰先生打电话给白先勇先生时提到我,他又说:“我要请李先生看戏。”第二天我打电话给白先生:“票源太紧张,不必再请我看戏了,不如约个时间谈谈文学。”“对呀,我们从来没有谈过文学。”一对彼此的时间,真正见面却在一个月后。白先生的住处客厅一角挂有白崇禧将军像,另一角则是昆曲人物的模型。白先生正在致力撰写的传记作品《仰不愧天——白崇禧将军传》,充分利用回忆、口述、信件、演讲稿等第一手材料,力求使自己的史笔不同于才气纵横的小说写法。其间因热心推动昆曲之故,数度耽搁。

我们的话题从台湾大学外文系说起。我在纽约访问过夏济安先生的弟弟夏志清,对当年台大师生风云际会的旧事不觉神往,再听白

先生重温历程,更叹惜夏济安英年早逝。白先生则问起我对梁实秋、陈之藩、余光中、琦君、林海音、林文月的看法。

细说台湾文学,一甲子的光阴恍如昨日。白先生说:“如果以后要写华文文学史,从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八〇年代,这一段是台湾文学最重要的时代。而中国大陆从一九四九年到‘文革’结束,那一段的文学基本上都是为政治服务的,从文学的角度来说,缺少重要作品,刚好台湾文学填了这个空。在保留某种传统的方面,台湾不见得做得好,可是至少有一种延续性,不像中国大陆起伏太大。现在中国大陆正在恢复,要花好大的工夫。”

我问:“一九四九年之后,台湾成长的作家中,有哪些人的作品值得重视?”白先生道:“有些还不能盖棺论定。我觉得在台湾文学史上,可能至少有几篇东西可以留下来,像王禎和过世了,我觉得以后会给他一定的地位。还在世的,陈映真有些短篇小说的确写得好,王文兴的《家变》是很奇特的一本书,陈若曦的《尹县长》、欧阳子的一些心理小说,台湾文学史上都应该有他们的地位。”而谈起后辈作家,白先生笑道:“青壮年的一群,写得很好的,像朱天文、朱天心、张大春、骆以军,产量很丰富。中国大陆就好像一大堆,听说一年有一千部小说,我都来不及看。”

一九五六年,白先勇考入台南成功大学学习水利工程,一九五七年重新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。一九六三年,他到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从事创作研究,一九六五年获硕士学位,此后长居美国。虽然与台湾文化血脉相连,白先生生活最长久的地方却是美国。在文学创作上,他的眼光始终关注中国人。他说:“我的很多小说都是在

美国写的。但是《台北人》看不出是在美国写的，没有美国味，是回忆的东西。《纽约客》当然讲跟美国的那种关系，其实我还没有真正写到美国，我顾中国的历史都还来不及呢。美国也有好多故事可以写。”

去国多年，白先生依然深抱中国情怀，谈到台湾的族群关系，他说：“当年我们《现代文学》杂志有一群人都是台湾作家，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台湾人，没有省籍之分。台湾人哪个没有外省的亲戚，外省人哪个没有台湾的亲戚？通婚那么久了，都有这种关系的。也不能说本省人和中国大陆没有感情，追溯起来老祖宗又在漳州、泉州等地。政治上是这么弄的，血缘上却很难分。撇掉政治，还是比较容易融合在一起。”

近年来，为了推动昆曲发展，白先生甘当“昆曲义工”，常到大陆。他谈起感受：“大陆太复杂了，这些年来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，像上海这几年造出那么大的新城来，像广州一下翻了个身。一下子喷出的力量很惊人，这是一喜。中国超速发展，也有一忧，环境的破坏，人心的浮躁，需要冷静对待。经济起来了，我们老祖宗的东西，有什么对现在还有用？欧风美雨统统刮进来了，西方的东西拿过来怎么用？其实都是很困难、很严肃的课题。现在好像整个社会太急了，都在追求马上见效的业绩。应该坐下来深深思考，我们这个民族到底要走什么路？”

白先生热情地回顾昆曲受欢迎的盛况，无论是北京、上海、苏州、广州、深圳、台湾，还是美国、英国、希腊、新加坡，他无不讲得眉飞色舞，由衷感慨：“昆曲完全是普世的，我想它在文化上达到了美学的高

度,能够打破国籍、语言、文化背景的界限。”白先生也坦言:“昆曲花了我太多时间,耽误了我的写作,耗费了我的精力。我希望坐在下面作为一个观众,不用自己做。但是,我眼看着昆曲真有失传的危险,老师们都老了,快教不动了,要快点抢救。”

白先生说:“我现在最关心的议题就是文化。我们有过相当辉煌的文化传统,从十九世纪以来,这个传统式微了,还没恢复过来。我觉得二十一世纪是一个转折点,中国需要一个文艺复兴。我这个时候拼命推广昆曲,希望拿这做个样板,希望我们的古文化还能够有新的生命,还能够打动所有华人的心灵。”

“文学”是我们的宗教信仰

李怀宇:你在台大外文系时,夏济安先生的影响是不是很重要?

白先勇:夏济安先生可以说是我们的文学导师。第一,他办了一本《文学杂志》,我觉得是台湾文学、学术水准最高的杂志。《文学杂志》撰稿人以台大外文系、中文系师生为主,也有社会上的作家。我个人就是受这本杂志启发的。第二,夏先生有非常特殊的文学灵感,尤其对文字、人性、作家的观点非常独到,具有启发性。他很低调,不是像五四运动那样的文学导师。我们几个学生常向他求教,他有一点口吃,讲课紧张。他私下给你的指点,如醍醐灌顶,一点就把你点醒。

我随便讲一下我的文学因缘。那时候我在台南,突发奇想要去三峡建坝。我在地理书上看到,好像三峡建一个坝,中国就会强

起来:有多少瓦的电,能灌溉多少田。年轻人那种理想,其实是完全不切实际的。那时只有成功大学有水利工程专业,我就去念成大的水利工程。本来我是被保送到台大的,可随便选什么系。可是,我自己申请到成大,念了一年之后,我想我最多做一个二流的工程师,我的数理科、工程化、设计不行的,也没兴趣。心里都是文学创作的冲动。有一天,我在书店里看了夏先生的《文学杂志》里的文章、小说、诗、译作,如获珍宝。我知道夏先生是台大外文系的老师,中学的时候,我就对他的文学见解很心仪。我父母当然希望我进台大,等于北大清华这种大学,我不去念,跑到南部去念一个学校,他们不解。现在好啦,念了一年,兴趣不合又跑回来。我非常感激父母对我的信任。第二年,我也没跟我父母商量,先斩后奏去参加联考,那时候要填好多志愿,我只填了一个台大外文系,后来就考取了。进了台大外文系,我就去找夏济安先生。

李怀宇:我在纽约访问夏志清先生,谈了很多夏济安先生的事情。他很怀念他哥哥。

白先勇:夏济安先生对文学有了不起的见解。他是给你点一下就通的那种老师。他对我也蛮赏识的,给了我很大的鼓励。后来我的第一篇小说叫《金大奶奶》,拿给他看,他就登了。第一篇小说就登上我最希望登的,最喜欢的杂志。后来我们自己办《现代文学》,当然受他的启发。因为他到美国去了,那我们自己就办杂志。其实一九五〇年代新的文学刊物已经火苗萌动,除了《文学杂志》以外还有一些诗刊,余光中先生的《蓝星》,还有《创世纪》、《现代诗》等。

李怀宇：余光中先生写文章说，《文学杂志》夏济安先生是在前面主持，吴鲁芹先生是在背后默默支持。

白先勇：他是在背后默默支持的。他写得一手好散文，很老练的笔法。他的影响不像夏济安先生那么广。夏济安先生很有意思，他自己并没有什么中文著作，大多是英文著作，像《黑暗的闸门》，写鲁迅也很深刻。

李怀宇：他很可惜，最好的年华就走了。

白先勇：是。但是他的文学见解影响了我们这辈人。他述而不作，有点像孔子那种教学方式。我常去找他聊天，到宿舍去请教他。

李怀宇：如何理解你这一代所处的文化环境？

白先勇：那时候文学的火苗已经起来了，欧洲的新潮电影刚好传到台湾来，属于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潮从各方面的管道都传到台湾来。我们这一代是很特殊的。我生于一九三七年，抗战那一年，我的童年在抗战中度过；抗战胜利以后，是我的青少年时代；到了我读大学时在台湾，是安定的一个世界，我们能受到正规的教育。在这些师长的陶冶之下，我们受的教育一方面是传统的古文、古诗，另一方面又接触到西方的现代主义。这种环境下的因缘际会，我们就有一种求新望变的心理，因为跟前面一代的生活经验、价值观都不一样了。这是时代造成的。我们的《现代文学》杂志是一九六〇年创刊的，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很要紧。台湾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〇年，已经十一年了，整个社会稳定下来了，我们也成长了。我们的背景，有些是大陆来的外省人的第二代，像我、王文兴、余光中。本省人的第二代也起来了，他们的父兄接受的是日本殖民教育，他

们接受的是国民政府的中文教育,他们也成长了,像陈若曦、欧阳子、黄春明、陈映真、施叔青。香港侨生像刘绍铭、戴天、叶维廉。还有像痖弦、洛夫这些军中的大兵,也写起诗来了。

我算是登高一呼,大家办了本杂志,叫《现代文学》。没想到后来《现代文学》变成那个时候文艺思潮、文学运动的焦点、摇篮。现在回头看,它的意义在于给这一群人一个园地,如果没有这本杂志,可能我们这些人就都散掉了,可能有的人也不写了,有的人写了也没地方发表,那时候很难发表的。

李怀宇:有个园地很重要。

白先勇:我们有这么一块土地,让这些很有才情的年轻作家,或者是希望要当作家的年轻学生,这么一群有志于文学的人来耕耘。我常常讲,那个时候“文学”两个字是大写的,高高在上,是我们的宗教信仰,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所在。因为那时候社会风气比较保守,政治上还是威权时代,但是现在回头想,那个威权时代我们杂志还能生存,这是了不得的,是华人世界里有限度的自由。还好国民党没有把文学看那么重。国民党忙别的事去了,文学是很空的一块,只要不明目张胆地骂当局或者是批评领袖,政治上可以暗暗涉及,不是涉及太多,是可以生存的。所以,有限度的自由,对我们心灵的自由很要紧。那是我们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一种管道,一种出路。那个天窗,看得到外面的世界。我们那时候也整个投入,对文学多少有点五四运动的余绪在里面。